

吴士余

著

清史

明鉴录



中西書局



清史

明嘉靖

吴士余
著

清史

明鉴录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明鉴录/吴士余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10
ISBN 978-7-5475-0670-7

I. ①清…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772 号

清史明鉴录

吴士余 著

责任编辑 唐少波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版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数 295 000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670-7/K·138

定价 39.00 元

作者简介

吴士余 1945 年生，浙江镇海人。资深出版人，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兼《书城》杂志社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委、副总编辑，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顾问等职。现任《上海出版志》常务副主编。

出版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学术随笔《守望理性》等。其学术成就收录于《中国新文学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辞典》(韩文版)、《世界名人录》(香港版)。1999 年获“世界文化名人奖”(香港)，2006 年获上海出版人奖。



吴士余著作

野草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古典小说艺术琐谈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水浒》艺术探微

重庆出版社 1986 年

文学,现代人的思考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

小说形象新论

学林出版社 1989 年

中国小说美学论稿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

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

边缘阅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守望理性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再望理性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年

行走文坛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年

吴士余自选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庸以清宫为题材的新武侠小说风靡文坛,随之《戏说乾隆》的电视剧也走红了大江南北,紫禁城的清宫戏就此历年不衰。经典重现,新作迭出,屡屡见诸小说、影视银屏。紫禁城后宫嫔妃争斗的连续剧《甄嬛传》也冠名清宫版杜拉拉升职记,广受媒体的造势炒作。清朝历史被编剧、作家们演义,叙事释史,挖掘现代元素,追求戏剧效果,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世俗化的文化诠释,满足多元文化消费的需求,也是无可非议的。无论是信史正剧,还是戏剧化的闹剧,目的均是要追求一种能引起读者、观众共鸣的审美效果而已。

若将清朝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读史释义的文化价值还在于以古鉴今,以知兴替,洞悉历史的哲理,探寻历史的核心价值,吸纳历史的智慧。自努尔哈赤建国,1644年多尔袞率兵进入北京紫禁城,近三百年的历史充满着变局。清朝既是古代的终结,也是近代的开端。其间,不乏励精图治,文治武功的盛世;恪守陈规,千疮百孔的衰落;更有丧权辱国,难以启齿的国耻。人们之所以热衷清朝史事,除却紫禁城充满着神秘与戏剧性,更是因为清王朝自始至终纠结着危机与变局。其官僚系统、政治、经济体制承继着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又在变局与危机的交替中沉积成一种善美、恶丑兼存的封建文明,成为人们的文化记忆。尤其是,这些文化碎片潜存于人们的无意识之中,阅读、诠释清朝史事常常会引发人们的人文思考。然而,要真正理解历史,文化记忆就不能流于浅表的审美,止步于演义化、情感化的审美创造与价值评估,它往往有碍于历史真正价值的发现。因此,阅读历史需要理性的审视,洞察、把握蕴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核心价值,化陈腐为智慧,这才是读史的文化追求。

自古以来,知识贤达很注重历史智慧的发现与承传。所谓:“正朔之事,当明

示变改,以彰异代”,说的是探寻迁革变化、循环演进的规律;“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道明总结兴衰成败教训之必要;“观其始末”,“定一字之褒贬”,“其教益出政教典章之先”,是要求建立明是非,通古今的价值评估;“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强调观照资治通鉴之哲理的人文思考,等等,莫不是透过历史表象,探寻盛衰兴败的历史轨迹。认真而理性地面对这份历史遗产,将有益于当今中国现代化变革的思考。

也许出于如是人文情愫,笔者努力去读懂历史,理解历史,求证人文思考的价值判断。笔者治学起步于小说美学的研究,因专司社会科学的出版业务,才逐步将视野投注到人文、历史领域。因此,诠释历史不能像科班出身的清史学者,执著于宏观的史学框架和体系的建构,只是出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偏爱,选择文化随笔的书写,就正史实录琐细的史事记载,就事论史,析理于诠释之中,企求以当代人文意识的价值评判,思考历史的陈述,感悟历史的哲理。因此,随笔书写仅是以小见大,难免有以偏概全、臆断附会之虞。著述之言说望能求正于专家。

历史学家邓小南说得很到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的中国。此话颇具哲理。若要真正悟透,也需要智慧。

Contents | 目录

序	1
智者康熙	1
诚和善治之道	4
经筵日讲	9
靳辅治河八疏	12
倡廉的清官效应	15
文治安邦	21
尊贤举才须显真诚	26
立皇储的吊诡	32
雍正讲政治	37
除弊方能立政	39
养廉银新政	43
改革政制的考量	48
造势道德教化	56
胤禛说禅论佛	64
告密的制度化	69
挟“文字狱”治天下	75
还原乾隆	80

宽严相济	82
匡正学风	86
圆明园的记忆	92
利义并重的治生之道	100
另类官场	105
和珅的潜规则	110
盛亦乾隆 衰亦乾隆	116
嘉庆的偏执	121
整肃官场四风	123
内外兼治禁鸦片	127
维稳的人口危机	130
闭关表象的历史轨迹	136
道光的悲剧	140
整治司法乱象	143
解读姚莹案	147
海运漕粮的困局	155
两淮票盐改革	161
道光的补丁秀	168
咸丰同治堕落自戕	172
咸同重臣曾国藩	175
奕訢的洋务自救	181
左宗棠的船政	185
富国梦的交锋	188
晚清民企的发轫	193
宿命光绪	197
杨乃武冤案的博弈	200
荒政禁烧锅的启示	205

教改之殇	209
路政的创新驱动	218
昭信股票流产	227
清水衙门的浊流	231
珍妃遭贬真相	235
禁教的错位	238
三朝元老的官诀	252
官场谴责小说的滥觞	264
后记	270
增补再记	271

智者康熙

粗识康熙,恐怕不少一般读者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及相关的影视作品。少年天子康熙与宠臣韦小宝,设计捕杀力大无穷的奸臣鳌拜。韦小宝的狡诈,康熙的冷静、随机应变。两个十多岁的顽童扳倒身经百战的大将军。这当然是金庸的戏说了。

民间流传过一个恐惧的传言。旗人入中原遭天谴报应,清宫传染起天花,此病无药可医。顺治帝就是得天花暴亡。康熙两岁得天花,弃至宫外,幸得汉人婆婆的精心照料,得偏方而复活。大难不死而获终生免疫,赢得了皇室继统的唯一条件。这也是坊间的传闻而已。

康熙继承大统,确是祖母孝庄太后的决断。孝庄是个极具政治睿智的贤者。当年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目的是要多尔衮扶助儿子福临(即顺治)承继帝位。孝庄遴选接班人的首要条件,是对政治大局的洞察能力,以及驾驭复杂政务的定力和谋略。在诸多皇孙中,唯有康熙聪明好学,勤奋研读儒家典籍四书五经,对君臣之礼、治国之道颇有心得。正是如此天赋,才获得孝庄的青睐和顺治的认可。自康熙六年(1667),少年天子十四岁登基亲政,到五十一年驾崩,亲政长达五十六年,开创大清盛世,确实彰显了治国之雄才大略。

康熙治国之要诀,就是两个字:一诚,二和。诚者,取信于民,以诚为正道;和者,和而不同,不走极端。要做到这一点,须有宽广的政治胸怀,以及“以民为本”的人文情怀。康熙的一生是乎实践了“诚和善治”的诺言。

康熙之文治武略得益于对儒学思想的理解、认同和应用;也善于在处置具体政务中体悟成败得失和政治志向,且举一反三,考查利弊,总结经验。诸如,靳辅治理河患之沉浮、曲折,康熙从中体悟到为君、为臣均应以重民生为国固之本;用人任贤,既要兼听,更要督责,不图政绩之虚名。这些体悟便来自中国儒学传统

的哲理启迪。正如康熙所言：“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为此，康熙亲自主持“经筵日讲”，读讲儒学经典。这种类似高官读书会可谓是一个创举了。

以民为本，是鉴定官吏能否廉政、勤政，政府是否清明公正的试金石。康熙自然将“吏治清浊，惩治贪污”列为政务之要。官吏腐败，政府焉能清明？民何以聊生？社会何以和谐？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 1654—1722), 八岁登基, 十四岁亲政, 在位 61 年,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 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 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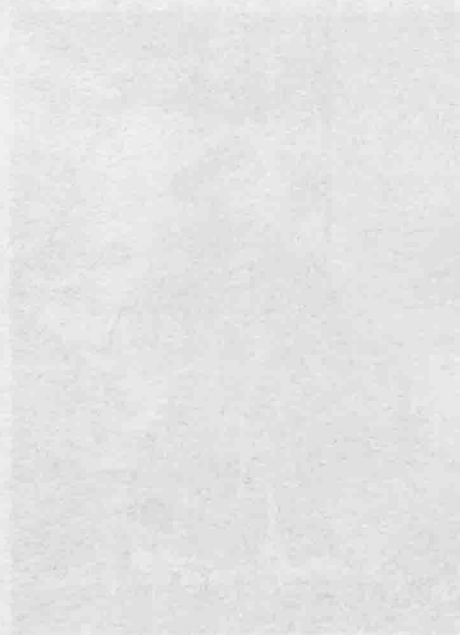
中国儒家是理想主义者, 康熙亦然。树清官典型, 训勉封疆大吏, 问责内阁重臣, 目的是要营造廉政的从善之风。可惜的是, 晚年的立皇储之争, 宫廷陷于内乱, 政务疏于监督而放任松弛。康熙无暇顾及廉能吏治, 由此, 冀希清官效应的廉政建设便成了虎头蛇尾的烂尾工程。康熙的晚年有心无力, 只有发出无奈的叹息了。

康熙在统一台湾, 抗击沙俄, 平定噶尔丹之乱的内政外交上, 均取得骄人之成就。然而, 影响力甚巨, 至今还哺益于华夏民族的, 还是文治兴邦之举。康熙将承传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列为安邦兴国之要务, 招聘鸿儒, 编修《明史》, 编纂《古今图书集成》, 为中华文化史搜集文化珍籍, 这才是造福于千秋万代的功绩。康熙集典修史的文治, 尊重知识士人, 倡导学术公正, 求同存异, 善于融合多元文化观念, 更是营造了文治兴邦的文化语境。若说史无前例, 康熙是当之无愧。

康熙的文治武略可圈可点, 但一生最大的败笔却是立皇储。出于对皇后赫舍里氏南巡途中病逝的深情和内疚, 将钟爱之情倾注于二皇子允礽身上。无论是幼小的帝王教育, 还是对允礽狂妄自大、任性的迁就, 都灌注着一个父亲的至爱。选择接班人的冷峻、理性、政治智慧却被亲情的短视所遮蔽。允礽的结党营私, 搞乱了朝纲, 挑起了众皇子的内斗, 分裂了朝臣。立皇储的吊诡摧残着一个

临近暮年的康熙。最终,康熙把挽救大清王朝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密诏上,让历史作出判断和选择。

康熙是智者、伟人,但也是个凡人、俗人。当脱去黄龙袍时,圣人也摆脱不了亲情的纠结,也有无可奈何的遗憾。



诚和善治之道

清军入关，剿李自成，灭张献忠，南下逐鹿中原，终以武力统一全国，建立新王朝。满洲八旗的披坚执锐及“首崇满洲”的治国之策，却难以磨灭明末社会尊汉斥夷的文化心理。满汉冲突和隔阂成为清初社会失衡乃至对立的重大隐患。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650)，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皇太极死后，以摄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并于第二年率八旗军入关。是确立清初政权及清廷各项政策的最重要的决策者，后加封至“皇父摄政王”。

摄政王多尔衮为征服汉民社会，施之武力杀戮与文化专制的暴政：强行“留发而不留头”的“薙发令”，诏令全国通用满文、满语，兴文字狱等，便是所谓“攻城”兼“攻心”的以威治国。天聪八年(1634)，多尔衮诏令将官员、城邑的汉文名一律改用满文，并召集群臣训谕，力戒效法汉俗。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入南京，即令限十日之内改装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江南民众以“头可断，发不可断”之誓抗议剃发，清军则暴行“嘉定三屠”，残杀全城二十余万人予以镇压。有书商毛重倬、胥庭清等坊刻选文，仅因序、文纪年使用明代沿用的干支，未用清顺治年号，被扣上“目无本朝，阳顺阴违”之罪被处斩。汉民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戮”之灾则比比皆是。清初的满汉对立，社会失和，致使

社会畸形：一面是清廷的暴力镇压，政治、文化的专制；一面是汉民反清情绪沸腾，在大清一统的表象下，暗淌着对立和抗争的激流。

改朝换代之后，如何缓解满汉对立，平息民怨，和谐社会，安抚士绅商农不同人群的融合共处，则成了康熙亲政殚虑图治的当务之急。《清史纪事本末》^①记载了康熙治理社会的策略和才能。

康熙亲政，首先尊奉程朱理学为圣学。他对理学的一个感悟便是以诚、和治理社会。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此道乃是一谓诚，二谓和。程朱理学讲得很清楚，诚者，取信于民，以诚为正道。诚信丧失，误国殃国。和者，和而不同，不走极端，不偏失一方，融则和，斥则伤。康熙在阅读明永乐年间编的《性理大全》时，作了一条御批：“大指只一诚字，人可不以诚自勉乎？”康熙九年在颁圣谕治国要策的十六条中，其第七条明令：“黜异端以崇圣学”，还特意朱谕九卿各部衙：“有明于性理实学之人，令各举所知。”其用意是，今后将优先提拔通晓理学要义之士。康熙的目的是要统一思想，树立以诚和善治之道的国家意志，消弭满汉之间的裂痕和文化隔阂。

据记载，康熙着力善治的主要有五项：

禁止圈地，限制特权。清入关建朝，多尔衮以八旗禁旅为“国家根本所系”，“应如恩爱养”为由，饬令兴土木，为八旗兵丁造房、娶妻生子。此项政令名为抚军，实为满清贵族跑马圈地、侵吞民间房田开了绿灯。圈地之政，加剧了官民、满汉之矛盾。康熙对贵族圈地引发的社会动乱关之甚切。他认为，继承祖先的基业，在于“安天下，抚育群生”，“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生民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为调息民怨，颁诏二令：一令永远停止圈地，“圈占民间房地永远停止”，“所已圈地者，悉令给还民间”。满汉军民，原无异视，一视同仁。二令废除藩产变价。清初曾规定，各省将查明废藩之田房可变价售给耕种者。汉民贫困，无力购地。此规定形同空文，但却成了贵族廉价兼并房田，变相圈地的合法通道。康熙决定废除变价，将地田交与原耕种者，“改为民户”，“永为世业”。禁止圈地，废除变价，显然是限制了贵族利益集团的特权。康熙之举虽与近代的“均田赋”、“耕者有其田”的民权思想有天壤之别，但试图缓冲尖锐的社会

^① 本书引用清史资料除注明外均取自白新良等主编的10卷本《清史纪事本末》（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对立,不失为明智之举。

尊重汉俗。民间俗习,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和中华文明的表征,对稳定社会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清初的“薙发令”之所以引发社会震荡,也是因为凌辱了汉文明和文化俗习而诱发民族情绪的愤激。康熙朝则将尊重汉俗,提倡不同民族习俗的相互融合视作“以诚治政”的重要举措。康熙亲政仅数月,便批准推行“三从三不从”的新政,即汉民改俗,可男从女不从,官从吏不从,生从死不从。此后,清朝两百多年,女子可穿明代衣裙、梳汉式发髻,衙署吏役可着汉式差服,死者入殓可解发辫,穿汉式衣裤。由此缓和汉民对异族习俗强制取代的抵触情绪。汉族民间有一种乡饮酒礼的风俗。每年春分、秋分,乡间族人共聚一起饮酒祭礼。德高望重的族中长辈在祭礼中寄勉族人,祈福平安,祝愿来年风调雨顺。康熙认为,尊重如此汉俗,有助于群体的亲和,促进社会和谐;对清王朝而言,劝诫满族仿汉成俗,不仅可以弥合满汉的文化隔阂,而且可在民间倡导一种民族和谐的社会氛围。因此,康熙下达行政令,着八旗所辖的满、蒙各地均推行“乡饮酒礼”的汉民习俗,军队亦参加民间乡会,改善八旗禁军屠城之酷政形象,邀请汉人中“年高有德”者与会。康熙尊重汉俗之举,营造统治者的亲和力,是独具匠心的。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貽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清初杰出诗人。

向汉族文人开放仕途。满族官员治政存有先天不足,对汉民社会知之甚少,又且长期的军旅生涯,缺乏必要的治政经验和学识修养。康熙亲政后,把开放仕途,让汉人参政以汉治汉,视作缓和满汉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九年,康熙颁诏全国,命各省、府、县官衙推举品才兼优的明末遗老和知识贤能,并在各地张榜告示,“凡山林隐匿,有志进取者”,均可应聘,以便擢用。另外,增设南书房,选聘博学善才者任南书房“行走”,与内阁大臣讲论应对,共商国事。由内务府专拨房屋居住,让汉士潜心治学。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领袖王士禛、